

九州

九州

中国杯

53

版社

98
K203-53
7
L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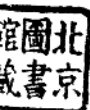
九州

(第一辑)

唐晓峰 李 零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C 280330

《九州》编辑委员会

本辑主编 唐晓峰 李 零
学术编委 辛德勇 李 零 李孝聪
林伟仁 林梅村 赵世瑜
唐晓峰 管沼云龙

联系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感 谢:

唐元元女士

刘斐琰女士

管沼云龙先生

对本书出版的赞助

《九州》第一辑

目 录

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代序)	唐晓峰 (1)
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	李 零 (5)
蔡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	徐少华 (19)
韩信平齐之役地理新考	辛德勇 (42)
五岳地理说	唐晓峰 (60)
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	林梅村 (71)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演化 ——以江南运河城市为例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方案研究	李孝聪 (80)
敦煌归义军历史时期的动植物	刘 一 (105)
论明代都城文化特征	李宝臣 (113)
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高王凌 (138)
19 世纪北京地图, 步军营委署步军校的官厅部署	许进雄 (152)
地名——三江平原环境变迁的纪录	孙冬虎 (192)

STUDIES O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CHINA CONT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st Territory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Preface)	Tang Xiaofeng (1)
The Great Geographical Views in Ancient China	Li Ling (5)
The Bronze Vassal of the Cai State and Some Question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Culture	Xu Shaohua (19)
A New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Battle of Conquering the Qi State	Xin Deyong (42)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of Ancient China	Tang Xiaofeng (60)
An Important Evidence about the Relation of the Western Han and the Da Rouzhi found in the Niya Ruins	Lin Meicun (71)
The Locations and Forms of the Canal Cities in the Imperial China	Li Xiaocong (80)
The Animals and Plants of Dun Huang Area in the Period of Gui Yi Jun	Lewis Mayo (105)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pital of the Ming Dynasty ...	Li Baochen (113)
The Critical Chang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Modern Times	Gao Wangling (138)
A Study of the City Map of Beijing of the Nineteen Century	James Hsu (152)
Place Name - The records of the Changes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San Jiang Plain of the North - Eastern China	Sun Donghu (192)

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代序）

唐 晓 峰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是在辽阔的疆土之上融合缔造、壮阔发展。因而，从观念到事实呈现出独特的、强烈的、复杂的大地域地理特征。在辽阔地域中建立牢固、统一的大帝国，发展“广被四海”的华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对的巨大挑战和由之获得的辉煌成就。为了推动对中国大地域历史特征的研究，我们成立《九州》编委会，编辑《九州》丛书，意在汇集各方学者的成果，展示这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地理现象，从而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传说时代的上古帝王是华夏文明开基创业的代表者，在他们的传说成就中，理所当然的包含着处理大地域问题的一系列丰功伟业。舜是第一个实行了大地域一统措施的帝王，而禹的“九州”，更是我们的文明在大地域上确立的神圣象征。本书以《九州》为名，就是要表达我们对劳身焦思的创业祖先、对这块神圣大地的崇敬。

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还在数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便创造了“九州”、“五服”、“五岳”、“四海”等气魄宏大的天下观念。而文武周公秦皇汉武所率领的社会实践者，则具体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会机制、由区域对抗到天下一统的过渡、在多样的文化区之上成功地覆盖统一政治体系等关键性的历史课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一些只有

历史，没有多少地域的国家殊为不同。“地”的问题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所在，故《春秋》“重地也”。我们的社会历史之学，从一开始，视野便跟随文明的空间步伐，西至空桐之山，北过涿鹿之野，南浮江淮，东渐于海，上会稽，探禹穴，涉大漠，登龙堆，在大空间之内，观社会发展，察人文现象。

“国土变改，民人迁徙”，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数千年来，在广袤的大地上不停变换着人文地理格局，最终积淀为今天的一切。在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中，若忽略了这些风云际会的古今之变，则忽略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复杂而伟大的经验。而在这一经验中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传统、文化情怀、民族意志，也随之会被浅薄地处理。大地域意识、历史地理观察应成为我们考虑社会历史问题的重要角度。

“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极盛矣。”管理大地域国家，是中国古代政治无法回避的特殊使命。政治区域系统，人口管理体制，城市体系延伸，以及多种社会制度的衍变，都与地域的辽阔性、区域的差异性密切相关。地域的分合方式决定了许多政治事件的本质，而区域的异同往往影响名物制度的实际状态。大空间的社会存在，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体制，而在小空间内组建社会生活的办法，在大空间中不一定适用。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在我们的“元典”精神之中，一开始，便追求能够跨越遥远物质空间的道德纽带。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我们必须从地理学的角度，充分评价这类行为在那个关键的时代所做出的重要社会贡献。大地域的文明需要“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宽容，同时也需要强有力的将家庭、社会、国家、天下整合为一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伦理系统。在古代社会的上层，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美德，主张“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在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推动下，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治理论，即礼法社会体制。在礼法社会体制内，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将得到一种由礼法

文化所陶冶的基本人格。普遍的道德教化，使皇帝不需亲自出马，而皇权无所不在。

“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在华夏大地分分合合的曲折历史中，产生了根深蒂固而感人肺腑的大地域国土信念，它是我们文化中历久不衰的主题，并有力地支撑着今日举国上下不可摧移的领土立场。同时，“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巨大的空间感又奠定了我们文学的表现力度，并培育起一代代炎黄子孙凌空大度的审美素质。对大地域的地理描述，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语言特色。与此同时，这些深情壮美的语言，又反过来赋予自然世界浓厚的、永久的文化内容，以致辽阔的大地、无数的山川都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亡所不有”，土地的辽阔，也带来过愚蠢的精神自大与闭关锁国的历史缺憾。广袤的土地也曾是沉重的负担。现代以来，某些人曾批评祖先为什么不搞出一个小国林立的像欧洲那样的多国局面，为什么不跨海经商，等等。当然，这类批评于学术，于救中国，都是无济于事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今后的发展，只能立足于大地域。中国历史反复显示，天下凋敝、万马齐喑的转机，恰恰蕴涵在国土自身的辽阔之中。国土格局的变化，调整，往往是转机过程的起点。总有某个地区首先更新，率先突破，进而延伸为整个国土的再度昌盛。再度昌盛，是一个地理过程。这种地理过程，是欧洲小型地域国家的历史模式所不能概括的。

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任何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深藏着某种地理学本质。只有揭示问题的地理学本质，才能完整地认识问题。把“纵向”谈惯了的老问题，再做“横向”观察，也会新有所得。例如六国用古文秦国用籀的重要发现，只不过是王国维对古文字问题作了一次地理学的处理。再如张光直等将夏商周三个时代，转换为夏商周三个区域，

重做观察，令不少悬疑迎刃而解。古史传说，向为扑朔，蒙文通、徐旭生等对古代族系的地域分析，于理清古史，颇有启发。历史地理之学在我国学术界已成独立之军，在人口迁徙融合、地区行政系统建设、城市体系发展、区域农业开发、古代环境演变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上，力作接踵。中国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正在被层层揭示，这一深刻的依托大地而演进的历程，在我们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的深层影响，也应受到关注。人文地理学是一件从大地的角度认识社会，又从社会的角度认识大地的学术利器，我们希望其他社会历史文化学科的学者对地理学观察方法关注吸收，促进地理之学向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渗透。

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

李 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早期的地理观念，直观性和整体性很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以“大视野”三字概之，讲一点粗浅体会：

一、天地相应的概念

《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个“俯”和“仰”关系很大。古人观天，直观印象是天作球形悬转；而察地，直观印象是地作平面延伸。前者同后者相切，只有半个球面可以让立在地面上的人看到。所以他们把天看作覆碗状，比喻成“车盖（或穹庐）”；地看作方板状，比喻成“车箱（或棋盘）”（案：所以“地”也称“舆地”，“地图”也称“舆图”，参看《淮南子·原道》），叫“天覆地载”。中国古代的天论（即宇宙模式）有所谓“三家”或“六家”，但早期真正流行的是“盖天说”。“盖天说”的“天”和“地”有一定矛盾，前者圆隆，后者方平，两相扣合，四角不掩。但古人仍按投影关系把二者整合在同一座标体系内。例如古人模仿“盖天说”做成的占卜工具——六壬式，就是把天地做成磨盘的样子：圆形的天盘是扣在方形的地盘上，沿着固定的轴旋转，二者有对应的干支和星宿（出土古式天盘，多作圆饼状，但上海博物馆藏六朝铜式的天盘是隆起的）^[1]。特别是《淮南子》的《原道》和《天文》还把天宇和地面同样按九宫格来划分，称前者为“九天”，后者为“九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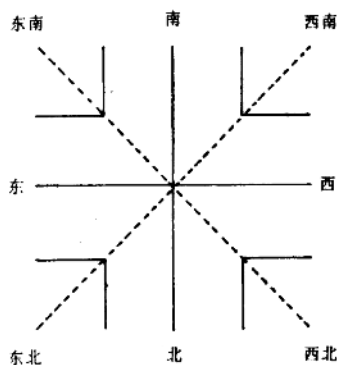
(案：《天文》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抄《吕氏春秋·有始览》。它以“九天”和“九野”相套，表示星野的概念，但并不是说“九天”等于“九野”)，连方圆的差异都可忽略不计。过去，我读《孙子·形》，不懂它讲的“九天”、“九地”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九重天、九层地，后来才明白它就是《淮南子》讲的“九天”、“九野”，其实是平面概念。同样，遁甲式的“九天”、“九地”也是这个意思^[2]。二者是对应安排。古人讲地理虽可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是天文，东西是靠昼观日景，南北是靠夜观极星。他们是在“天”的背景下讲“地”，所以“地”的总称是“天下”。

二、四方和极至的概念

古人讲天、地、人“三才”，人是介于天、地之间。但天是神的世界，地是人的世界。人与地比人与天关系更密切。古人讲地理，从来都是人文地理。凡与“人”有关的活动（如农业、土木工程和军事）多与“地”有关。例如古代兵家有个传统，为将要上知天文（明习式法、风角等术），下知地理。可是古代战争主要是在地面上进行，“地”的重要性自然比“天”大。《孙子·计》讲庙算有“五事七计”，“天”、“地”皆在其中，但书中讲“天”没有专篇，讲“地”则有《行军》、《地形》、《九地》三篇，占了很大篇幅。它所说的“地者，高下、广狭（狭），远近、险易、死生也。”（此据银雀山竹简本，今本无“高下”）其中除“死生”是兵家特有的概念而外，其他都是一般地理学所常用。“远近”是长度，“广狭”是宽度，“高下”和“险易”是高度和倾斜度。

如果撇开“天”不谈，光说“地”。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地是由两条射线穿越观察点作十字交叉，向四个方向作平面延伸（没有曲率）。这两条射线，古人叫“二绳”；四个方向，古人叫“四方”（方有旁、侧之义）。与“四方”的概念配

套，古人还把“四方”之间的平分线叫“四维”（“维”也是绳索之义），并把“四方”代表的方向叫“四正”，“四维”代表的方向叫“四隅”（“隅”是夹角之义），由此构成“米”字形的“四方八位”（现在也叫“四面八方”）。“四方八位”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概念，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例如美国西雅图的街道名往往就是按“四方八位”来标识，即以它的市中心（Downtown）为中宫，把周围分成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块，组成一个九宫图。中国古代讲“四方”，最典型的图式是“钩绳图”（图一）^[3]。“四正”是由子午（南北向）和卯酉（东西向）“二绳”来表示，“四隅”是由“四钩”，即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夹角来表示。



图一 构绳图

与“四方”的概念有关，古人还有许多与“四”字有关的地理概念，如“四郊”、“四野”、“四国”、“四土”、“四望”、“四陲”、“四封”、“四裔”、“四海”、“四荒”等等。这类概念的四个方向都是以观察者的眼睛所在为中心。古人把观察者的眼睛所在视为一种“极”（端的意思），而把他由近及远望出去的眼界范围

视为另一种“极”，称为“四极”。所以“四位”同时也是“五位”、“八位”，同时也是“九位”。这种“极”和电视上讲李乐诗登“三极”（南极、北极、珠峰）的“极”不同，完全是平面上的“极”。古人用以表示视野范围，除“四极”之外还有一个词是“四至”。例如《左传》僖公四年讲“齐太公之命”，就是用“四至”表示征伐范围，西周铜器铭文讲土地诉讼也是用“四至”表示田界范围。这种“四至”虽然总是讲“东至于某，西至于某，南至于某，北至于某”，强调的是“四正”，但实际上却常常是用立于“四隅”的“四封”（封土堆）来标识。也就是说是用四个角来卡定四条边。

三、九宫和空间的概念

古人为什么要讲“天圆地方”？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虽然“天圆”比较直观，但“地方”却不一定。人所看到的地平线其实也是圆的，并没有折角。从道理上讲，由二绳、四维构成的地平线，我们既可以把它画成方形，也可以把它画成圆形。画成圆形，可与天图密合，没有四角不掩的问题，本来更直观也更方便，但古人为什么还要把地理解成方形呢？我想这大概与视野的表现形式有关。熟悉绘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视野可以用焦点透视，也可以用散点透视。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就有散点透视的传统。我们观天，因为是仰观，视野比较开阔，焦点透视比较方便；但察地可就不一样了，你立在地面上看，必然看不远，看见的只是一小片，大面积的观察，如果不借助于抽象，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往起拼，采用散点透视。焦点透视，只有一个十字坐标，视野是辐射状的圆图。其远近距离和层次感是用同心圆，大圆圈套小圆圈来表现。而面积分割也是象切蛋糕那样，作扇形分割。这在实际使用上是不大方便的。而散点透视就不一样，一个十字座标可以变成很多十字座标，很多十字座标也可以变成一个十字座标，便于分割，便于拼接，也便于计算。它的特点是化线为

块，化圆为方。中国古代的方块图形是从上面讲过的十字图或米字图发展而来。比如十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四方”加“中央”的五位图，米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八位”加“中央”的九宫图。后者包含前者，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图（图二）。例如

	南	
东	中	西
东北	北	

图二

邹衍的“大小九州”，小九州是九宫图，大九州也是九宫图，内外都是九。还有《周礼》等古书讲到的里制，它是以方里为基础。古人说的方里和井田是一回事，它是由一井九顷之地构成的一个九宫图，但方里以上有两种拼联法，一种是按四进制，也就是所谓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还有一种是十进制（即方1里等于 1×1 平方里，方10里等于 10×10 平方里，等等），则是所谓井、通、成、终、同、封、畿的制度^[4]。还有古书中的国野制和畿服制，古人也习惯于把它想象成大方块套小方块，而不是同心圆。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以“计里画方”（语出胡渭《禹贡锥指》）为基础，局部是“方”，整体也是“方”。它对土地面积的测量、计算都很方便。例如《九章算术》头一章就是讲“方田”，它是以“方田术”作基础来研究其他形状的田，如“圭田”（等边三角形）、“邪田”（直角三角形）、“箕田”（梯形）、“圆田”（圆形）、“宛田”（球冠形）、“弧田”（弓形）、“环田”（圆环形），有一整套化圆为方的计算方法。方形比圆形好计算，那是十分显然的。中国古代的地面设计，不但田是方的，房子是方的，城郭是方的，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是方的，而且用以绘制地图的网格也是方的（参见裴秀“制图六体”）。所以也就难怪古

人要把地平面想象成一个大方块。

四、山海的概念

《山海经》把地平面划分为“山”、“海”两大类。“海外”包“海内”，“海内”包“山”，“大荒”和“海外”意思相同。有人以为“山”就是指山地，“海”就是指海洋，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第一，古人所说的“海”初义并不是“海洋”之“海”（即《说文》称为“天池”的那种“海”）。在古书中，“海”训晦（《释名·释水》、《广雅·释水》），本来是指“昏晦无所睹”（《尚书考灵曜》）、“荒晦绝远之地”（《荀子·王制》注），引申为“海洋”之“海”，只是因为古人观海，极目远眺，空阔无边，正是这样的荒远之地。例如楚帛书“山川四海”就是把“海”写成“晦”，《山海经·海外南经》“四海之内”，《淮南子·地形》引作“四极之内”。齐楚召陵之役，楚成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左传》僖公四年），《尔雅·释地》以四方蛮夷戎狄之地为“四海”，这些“海”就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同样，《山海经》的“海”，细读原书可知，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而只是表示荒远之地的概念。“海洋”之“海”，即百川所归之“海”，古人多称为“沧海”或“瀛海”。“沧”以象其色（字通“苍”），“瀛”以壮其大。例如邹衍讲“大小九州”，环绕“小九州”有“裊海”（小海），环绕“大九州”有“大瀛海”（大海），就是这样的“海”。当然，古人所说的“海”，即有亲眼所见，也有推导而得。例如齐威、宣、燕昭和秦皇、汉武派人入海求仙的“海”主要是今天的渤海或黄海、日本海这一带；而孙权派人入海求亶州、夷州的“海”则是今天的东海一带。再晚如法显、郑和等人的航海则更远，还包括南至马来群岛，西抵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但中国早期文献讲的“海”，主要是环绕中国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对其他两面的“海”毫无所知。邹衍设想的四面环绕大陆的“大瀛海”，西、北两面都是按对称原理推出来的。

第二，古人所说的“山”也不是简单的就是山地，而是有两重含义。一是与“海”（“海洋”的“海”）相对，代表大陆，就像古人把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叫“三神山”，是指高出海面的陆地部分。二是与“水”（河流）相对，像日月星辰代表“天”之“文”，它也是代表“地”之“理”。古人讲“地理”（重点是内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山”，一条是“水”，《禹贡》主水（《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亦侧重于水），《山海经》主山，但讲“山”必及于“水”，讲“水”也必及于“山”。二者互为表里，不仅可以反映地形的平面分布，也涉及到其立体的“高下”和“险易”。古人对“地”的认识虽然主要是平面概念，地表以下，他们因打井和采矿才略有涉及，知道的只是“黄泉”一类地下水和各种矿物，对地壳的构造不能深入了解。但地形分类的概念，古人还是很重视。例如《管子·地员》和《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篇就对高山、丘陵、原隰和川谷做了许多详细分类，“山”者概其高，“水”者括其下，是一种提纲挈领的东西。另外，象《淮南子·天文》说“昔者共工与颧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还以神话形式生动表达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总体印象（西北高而东南低，河流多东流而注海）。

五、九州的概念

“九州”是古代华夏民族对中国大陆的“核心部分”即其活动范围的一种板块划分。这种划分有双重考虑，一是按山水走向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二是按职责朝服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行政区划。“州”字，《说文》的解释是“水中可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禹贡》讲大禹治水有所谓“导九河”，“九州”就是配对于“九河”。这样的“九州”，应与九宫图式的设计有关。但要把